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政治挑战

丁学良：这些文章我事先都没有看，所以我只能根据他们口头的报告作评论。也许我提的一些问题在文章中他们已经谈了。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使用一些概念的时候，要注意两件事情。假如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的体系中间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概念，那么尽可能用现成的概念，不要自己再创造概念。这点很重要。我觉得，自己再创造概念的话，而人家觉得你的概念和那个所谓的“成为大家一种标准的分析概念”的东西有所差异，会不会引起一些误解？这是不必要的误解。只是在你确实觉得现有的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中间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现成的概念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创造一个概念，用你自己的概念。但你一定要交代清楚，你这个概念的定义是什么，否则这个对话很困难，对不对？第二个，对于一些术语，我觉得，在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还是要进行一些解释。比如说“政治改革”，刚才吴国光的报告里说，有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而吴国光说还是有些政治改革的，那么你就要给一个解释：在多大的程度上你们是实质性的分歧，在多大程度上是用语上的分歧，这样才能对话。还有，“政治镇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术语、中性的概念？我是赞成用“政治压制”的；用“镇压”的话一般都是最后一道了，机关枪和刀子都拿出来了，要流血了。另外，“政治吸纳”，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个非常好的概念，也能描述很多实际的情况，但是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概念？

裴敏欣：我希望，在讨论的时候，各位主要讲问题，突出问题。即把问题做得更尖锐化，少用那些学术术语。

丁学良：关于这个术语的问题，我特别想说，萧功秦这篇文章中间用的术语很多很多。比如说“post-totalitarian”，“authoritarian”，等等。据我所知，通常人们认为，这个“totalitarian”在变化的过程中，有好几种可能的方向，最有可能的就是“authoritarian”，所以这个“post-totalitarian”已经是把“authoritarian”包括进去了。你为什么要把两个概念都放到一起？你应该解释。如果你觉得解释不清楚，那你就还是用规范的语言做下去。还有一个就是“socialist totalitarian”，本来就是在 totalitarianism 的范畴中间。这个“totalitarian”最重要的就是两种，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你就用不着把“socialist”放到前面去了，因为“socialist”在西方的文献中间还有民主的思想，你搞到一起，就可能产生一些误解。还有“苏丹化”。你的“苏丹化”是指哪一些基本的制度？你这个“苏丹

化”，同以前别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中的像什么土皇帝当家啦这些问题，有哪些方面是共同的？有哪些方面是不同的？这都要有一些基本的交代。

裴敏欣：我们并不是来进行理论上的对话，而是讨论中国面临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仅学者感兴趣，最主要的是让一些并没有学术背景的人也能够感兴趣。刚才两位的发言，提出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国光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从九十年代以来采取的那些政治战略，虽然在九十年代有其成效，但是那个战略本身有自我矛盾，很大的自我矛盾，那个战略的可持续性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功秦兄则提出了一个总的说法，就是中国所谓“权威主义”或者“后全能主义”的发展，它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是也有自身的矛盾，又给自己造成了一种新的困境，就是所谓“苏丹化”。当然也可以用其他一些术语，比如“地方政权黑帮化”。我想，我们接下来先谈国光提出的一些问题，然后谈功秦兄提出的问题。

时殷弘：我不是研究政治学的，对国内政治只有一个感性的关心者的感觉。我想这两篇文章都很有价值。总的来说，我的感觉是，这两篇文章谈了非常基本的方面，谈了这个政权的稳定性，它所拥有的资源，有利于政治、政权稳定的资源和机制，同时也谈了否定性的因素和挑战。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权能不能可持续地稳定，这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考虑得很多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经过九十年代经济腾飞以后，确实有一些我们平常感觉到的很有利的因素，有利于维持政治的稳定。就是说，经过经济的改革开放，经济利益的分配确实造成了一种新的力量，他们在关心这个政权的稳定，把政权稳定看作是他们同生死共存亡的问题。这个“政治吸纳”，确实是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我的印象是，这几年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在构建一个金字塔。就是说，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政权对这个社会的基层的控制程度、影响程度必然会削弱，很多你就管不了。企业自负盈亏，工人下岗，农民的收入，对此这个政权不能完全包下来，它很大一部分就变成了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单位或者每一个群体自己的责任。因此，在这方面，很多先前能够由中央政权给予社会基层的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几年政府非常注意，比如说，提高知识分子的收入，特别是国家公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公务员的收入确实提高了。同时，这个政权非常注意党的年轻化、知识化等等。总的来看，它的想法就是，如果中国不能很快产生一个有利于持续政治稳定的民主制度的话，它要构建一个金字塔，至少在金字塔的中层，比如说有 2000 万人、3000 万人、4000 万人，就是公务员、军队的成员、国家机关的成员，不但有政治影响，而且生活

非常明显地比过去好多了；而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它希望，至少构建一个能够适应时代的、与时俱进的、有知识的、比较年轻化的党的领导机构。这样，社会下层，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它也管不了这么多了。这就是一个基本状况。

另一个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因素，就是：经济改革以后，社会增加了多样性。这在中国现在非常明显。任何时候，都有很多人对现状不满，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对现状很满足，或者说有许多人认为现状是可以接受的。这和过去有所不同，就是很难形成一个在政治上有足够能量的一种声音。

另外，我想政治学者一般都比较注意结构性的东西，而历史学者、人文学者可能比较注意“人”。我觉得，这个“人”非常重要。我觉得，一个非常有利于中国今后比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的因素，就是这个领导阶层，跟毛泽东时代相比，甚至跟邓小平时代相比，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个最大的政治特征，就是他们的谨慎。经过“六四”，经过苏东巨变，这个第三代领导层，包括第四代，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那个时候开始掌权的，他们的切身经验，就是这两大事态使得他们懂得必须极端谨慎，对任何事情，用江泽民 1989 年的一句话，就是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他们所以那么重视国家的经济建设，那么重视经济稳定，包括这个经济的策略、战略、软着陆啊，等等，所有的都是为了这个政权的稳定。他们已经懂得，这种政治谨慎是多么重要。我想，这一点，已经成为塑造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再一个，一个政权它极端、非常地重视稳定，有维持政权稳定的需要，在这种时候，我想，同其他情况相比的话，它就有了一个很重要地保证实现相当程度政治稳定的东西。经过“六四”，经过苏东巨变，社会精英，就是日子过得还可以的人，都非常懂得“中国不能乱”。这个社会精英阶层，甚至可以说，所有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当中获得利益的所有的既得利益者，我估计，起码有两亿人。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氛围是非常有利于稳定的，这个跟过去中国是非常不同的。我想，这样一些因素，不管我们用什么概念、什么模式来概括，也不管现在大陆上问题多多，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资源，是有利于稳定的。

反过来讲，也有非常严重的负面因素，不利于稳定。不利于稳定的因素，我个人的感觉呢，也是关系到“人”的问题，就是腐败和这个政权中的很多人的无能，再加上与极端谨慎相关的一个不大好的东西，就是过于保守，害怕冒险，害怕创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想中央也感到这个问题，所以最近两年来江泽民一直强调党的建设。他是意识到，即使我们有很多经济改革以来体制方面有利于稳定的东西，但是可能这个政权本身的能力会有问题。这个政权本身，这些人，这几百万官员，特别是高层人士，他会变得非常僵硬，非常无能，甚至会变得非常自私，从而缺乏一个在那么多复杂问题的背景下持续地维持政治经济稳定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腐败、无能、与极端谨慎相伴而来的过度保

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也关系到合法性和威望。从这一点来看，从这个群体的能力和素质来看，我觉得应付危机的能力可能低于过去；从合法性和威望来考虑，那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腐败、无能跟过度保守结合，是不是意味着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尽管我们很难设想，但这种危险一定会到来，有一种比较严重的潜在的前景。刚才两篇文章都没有假设危机的情况——如果碰上大事，有内部危机，外部的危机则可能是战争或者是台湾问题——如果危机到来，这个政权是不是足够健康，足够有力，有它的威慑力，有它的基础，能够避免失败了的国家的前景，失能的国家的前景，或者是半失能半失败的前景？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忧虑的。

孙立平：在很大程度上，我在社会问题上持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而在政治上则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刚才这两篇文章，都是从这 20 年改革的历史脉络来推断一个将来可能的前景。按照这样的一种分析方式，总是若隐若现地暗示了某种路径依赖的逻辑。这个东西是不是主线呢，不一定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看它这个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结构先于制度”。什么意思呢？‘结构’就是指社会力量，社会力量的组合；‘制度’就是讲这个体制。我们现在看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比较，就能看到，各种思潮的变化、政策的取向，已经不像八十年代有那么直接的作用。八十年代，这个社会就像没有锚的船一样，有什么思潮就把它往什么地方推，有什么政策它就往什么地方推。九十年代的感觉，就像一只船已经锚在那儿了，思潮也起作用，政策也起作用，但是出不了大圈。无论什么政策，左一点也好，右一点也好，改革一点也好，保守一点也好，到最后的結果都差不太多，至少没有表面上的差异那么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下边已经有一个开始定型的社会力量了。

这样定型下来，至少出现了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出现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最早是建立在稳定话语的基础上，就是那时候广播里、电视里天天说的，稳定、稳定，老是重复这两个字。跟你说得要烦了，反感了，但是真起作用。怎么起作用？当官的说：“不稳定，咱这官就当不成。”做买卖的说：“不稳定，咱这买卖就做不成。”这样，就在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实现了最初的联盟。然后，在九十年代初，当时压制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情况下，以山东为代表，山东最早提出了“几不变”，然后其他省跟上。所谓“几不变”，就是说，保护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方针政策不变。这样，就在基层这一层，在地方这一层，形成了一个带有私人关系性质的关系，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保护和被保护的这样一种关系。这是这个联盟的深化。新保守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部分知识分子加入了这个联盟。然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联盟对社会的影响力，包括对公共政策的

影响力在增强；同时，它和其他群体之间正在构筑一种垄断边界，原来你看进入这个群体还多少有点门，现在这个边界逐步形成了垄断。

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年代？是政治体制在自身改革的同时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同意国光说的，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八十年代末的时候，香港的一个什么报纸，对我有一个访谈，当时我就说，其实政治体制改革走的路，比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明确。为什么？它实现了一个最基本的转变，就是从极权主义到专制主义的转变。这时候，出现的是自由，但是民主还谈不上。就是由一种全面的控制，变成一个非常有限的专制主义，这是八十年代的基本情况。八十年代这样通过政治体制推动实现了经济变革，然后经济变革释放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可以在市场中流动的资源，一个创造了它活动的空间。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催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八十年代本身，是新生的社会力量适应这个体制的一个过程。

九十年代呢，就进入了这个演变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苏东巨变，一个是“六四”。这两个东西，无论它本身意味着什么，在统治者那里，他的理解就是：我自身的存在受到了挑战。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统治者更加萌生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的那种意识。就是说，这时候，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加体现出他自己的主体性，有自己的独立的目标和独立的利益。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九十年代基本上是进入了一个“求稳定、求自保”的社会。实际上，他是往后退了一下，退到了墙上，他觉得他要把自己保下来。保下来之后呢？这时候，他为了自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上的进展。我把这种进展叫做从实质性的专制主义演变为‘表演性的专制主义’。最典型的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哪怕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上面有‘精神’的时候，他要传达，还要一个下午来讨论，你还要讨论出落实的措施来，过两天他还得汇报，汇报完了之后他可能还要检查。就是说，这个专制主义还带有一种很强的实质性特征。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甚至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后面这些环节他都不要了。他要‘讲政治’，要讲‘三个代表’，更多地是把它理解成一种表演，就是为了合法性的一种表演，后边的东西包括讨论可能还要进行，至于落实，那就算了，落实情况的汇报也就算了，检查就更谈不到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就是说，他把他自己要控制的东西缩到了一个更小的领域。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一些因素，就是刚才我说的，社会力量先于政治体制进行，他把他过去在极权主义时期或者实质性专制主义时期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功能，交给了一个新的治理结构。这个治理结构，是在一种表演性的专制主义下形成的一个新的治理结构。这个新的治理结构，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第一个，表演性专制主义的国家；第二个，高度利益化的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第三个，是民间的几种精英的联盟。我觉得，我们要看到，用

国光的话来说，有‘面积缩小’的一个过程；同时又要看到，他的治理结构有扩展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去看的话，很难说明他九十年代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那些成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阶段。

关键的是现在，是不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我觉得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这个新阶段是什么呢？经过九十年代的自保之后，他部分地恢复了信心，无论是从他的人事安排上来说，还是对他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来说，我觉得还是部分地恢复了信心。他在恢复信心之后呢，我觉得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从“三个代表”的酝酿开始，标志着这个统治者、统治集团，想寻求相对来说比较长远的一个出路。这个时候，“三个代表”不是仅仅说“稳定压倒一切”了，或者说，跟那个至少不是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包括“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等等这些东西的提出，包括“三个代表”，实际上他在寻求“我在这个社会中如何重新定位”。所以，我觉得，从九十年代末开始进入一个适应的时期。九十年代的时候确实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反正你碰我不行，别的都可以，但是你说你不希望我存在，不行。在九十年代末开始，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提出到“三个代表”，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在寻求适应，开始进入一个适应的阶段。经济、社会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统治集团怎么适应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他现在的目标。

在适应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因素，就是有两个东西在制约着：一个就是刚才国光和功秦的分析中看到的，就是一个路径依赖的关系，即如何确保党和这个统治集团的统治，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底线；第二个，他又要使这个东西和现在已经发生变化的那些经济社会的情况能够吻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制约他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而所有的矛盾也都产生在这里。这两个东西在他那里调和的结果，就是“三个代表”的形成。这“三个代表”本身也是有矛盾的。“三个代表”，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全民党。党章里所谓“中华民族先锋队”，就是全民党的意思；但是，大力鼓励资本家入党，又好像他要代表上层，那就是说，他又和西方的所谓保守党有比较相近的一种社会力量基础。为什么他找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基础？又要代表工农，又要代表资本家或者知识分子，就是这两个因素，在他那里协调，最后达成的一个妥协。“三个代表”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从理念思路上来说，代表着一种极权主义式的对新的经济社会情况的一种适应。为什么把他叫做一种极权主义式的？就是说，他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极权主义式的假定，即他面对的臣民或者群众、人民，是不分化的，是整体性的，因此可以有一个政治的集团来代表他们。他这里所说的“代表”，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很大的、很强的极权主义的理念。所以，这就出现了一种政治理念的倒退。

但是，我觉得，出路可能就在这儿。我觉得，“三个代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解释的可能性。这是从非常善意的角度去理解。怎么理解“三个代表”？不是理解成“代表”，而是理解成：这个党是分化了的利益的协调者。这里面，

他可以承认几个东西：第一个，承认社会利益在分化，分化成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集团；第二个，党在找一个超越的位置，超越这些不同利益，成为一个协调者；第三个呢，就是分化的利益是需要表达机制的，那么就可以为参与、宪政，甚至民主体制的建立，找到一个出路。当然，是不是到这块去找，这背后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的结果。但是，我看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从这一点上来说，有一点乐观的理由。

裴敏欣：时间有限，接下来，我希望大家注重四个比较具体的方面，我认为都是在政治的领域中非得面对不可的问题。一个就是政治改革问题：今后的政治改革怎么样改，改哪些内容，前景和风险是什么样。第二个是所谓党的建设：“三个代表”表明了一个方向，今后如果共产党真正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面临一些什么问题？特别是党的自身监督的问题。第三就是政治腐败问题：从功秦兄讲的和国光讲的，都看出来，由于缺乏一个监督机制，出现了地方政权的“苏丹化”或者大面积的政治腐败，这个问题对今后的政治稳定、经济的持续增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过去十年用的那些措施，现在看来，是否治标不治本？最后一个就是国家能力问题：用许多指标来衡量，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算是国家能力较强的。但是，过去十年来国家实际能力退化，这种趋势肯定会影响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可持续性。那么，是不是先谈政治改革问题？

郑永年：刚才孙立平讲的，基本上是社会层面的变化。如果从政治学角度看，我是比较悲观的。从江泽民所提的“与时俱进”这个话，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是被动性的政治，就是时代进步了，党跟着这个时代进步，‘与时俱进’。国光提出的“去政治化”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对理解中国九十年代发展非常非常重要。政治从各个领域退出来，就垄断它自己这一块。国光讨论到“公共空间”，我想加上一个“私人空间”。总之，通过展开这些概念，我怀疑中国的政治到底扮演了多大一个角色。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在九十年代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所有的发展都是在这个‘私人空间’进行的。毛泽东时代我们只有公共空间，没有私人空间，是高度政治化的，是通过动员机制。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从八十年代开始，这个私人空间就越来越多，所以中国好多的发展，整个的过程，能够发展起来，都是因为私人空间发展出来了，特别是私营企业。当然了，国家的政策对它的发展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过去是不重视它的发展，现在有了国有部门那一块以外的空间，它是自动地去发展。这就是说，社会发展有它的动力机制，不管你政治变化怎么样。它是这个社会、这个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个私人空间，中国就不会发展到这个样子。

私人空间增长的同时呢，因为公共空间、政治空间是保守的，那种防守型的，所以也带来了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这涉及到国光提到的“社会抗议”等这些方面。我觉得，这有几个方向。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保持政治冷漠，把他的精力放在私人空间里面，不放在公共空间里面。我想这是共产党所希望的。我的判断是，他这个“小康社会”的提出，就是要继续引导社会往这方面走，而不想你跑到政治方面来。我现在提“小康社会”，再过十年我提个“富裕社会”，一直提倡老百姓待在经济领域，而不要政治领域不要。在另一方面，它导致私人空间继续扩大，而公共空间继续缩小，那么，一个结果呢，就是出现一种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同的政治抗议。毛泽东时代是政治动员的社会抗议，那么以后的社会抗议、社会动员可能都会在私人空间里发生。在私人空间里发生也有很多种情况，一种就是刚才国光提出来的，是个体的、规模比较小的、比较分散的那种抗议。从另一方面看，在私人空间发展出来的这种抗议，国家难以控制，像法轮功那样，要出来就一下出来了。我觉得，这会使国家政权对之防不胜防。

还有一点是，这种私人空间的发展，联系到老萧所说的那个“苏丹化”，我觉得这也是分权的一种结果。但是，我倒是觉得，“苏丹化”不见得一定是负面的作用，“苏丹化”有它积极的作用。“苏丹化”对某些方面的作用，从纵向来说，就是多端、多头的统治，从过去的一个专制中心，变成很多很多的专制中心，这对中国来说不见得一定是坏事。中国如果跳不出光是一个专制中心这种状态的话，中国的民主化我想很困难。“苏丹化”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以前欧洲的封建化，从欧洲的历史看，封建的结构，就是下面有高度自治的这种结构，对整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是有好处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防止这个“苏丹化”。我觉得，现在这个“苏丹化”的负面作用，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决心来搞民主。只有到这个“苏丹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引进地方民主；因为只有民主能够遏制这个“苏丹化”，没有其他的任何办法。

这些发展的结果，我觉得，对北京政治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而这也是以后进一步促使它去改革的动力。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地方政府更重要了。我和吴国光前些年合写的书里就提出过，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个地方政府远远重要于北京政府。像这次十六大，我看到电视上那个 BBC 的记者拿着胡锦涛的大照片，问北京的一些市民，“欸，这个人认识不认识啊？”。都知道是谁。可是，如果你拿到广东去看看呢？对北京政府的认同，会大大地下降，下降很快。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既是负面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促使共产党会进一步地改革。

我对老萧的几点判断，不一定同意。老萧说，“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已经淡出了。”我觉得，现在没有人会回到完全平均主义的那个东西，但是，共产党会利用这个资源。不然，为什么现在把“小康社会”作为这个党代表大会的主题？我觉得他们很有见地。为什么会用这个“小康社会”？他是要用“小康社

会”来吸引一些还是处于没有达到“小康”状态的那种人，其中保留某些方面的平均主义。只是用一种不同的手法，但我觉得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的因素在里面。老萧还说的，“政治动员文化”这个东西已经淡出。但是，我觉得，比起毛泽东时代来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的制度来保证它不去政治动员。江泽民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想恢复政治动员，像“讲政治”、“三讲”、“三个代表”，都是通过政治运动来推行的。他并没有一个战略、正式的制度来防止这个东西。特别是党内机器的动员，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说“没有”还是过早了。以后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人，他的能力不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革命家，不是那样的革命时代，那么现在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了，问题是执政机制是什么？我们看不到有一套机制，一套非常有效的机制在里面。他还是要通过某些方面的社会动员，特别是他精英内部的动员来实现那些东西。也包扩通过国光所说的“精英的录用”，我觉得他的精英的录用方法也是一种动员的方法。它要建设一个新制度啊，都是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建的，因为它没有现代国家所具有的那套制度。

熊景明：我觉得吴国光对现在中国政治的整体分析和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做得相当精密，很精彩。他这个分析，比我迄今听到的所有分析，我都更认同。但是，有两个方面，我希望他可以修改。一个是，吴国光他刚才讲的，比他写的这个要更容易明白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才开始明白裴敏欣的苦心，要搞这样的一个会，出这样的一本书，就是为了帮助党。但是，像吴国光这样，我留意到，他历来写的文章，能够很准确地诊断问题在哪里，但是从来不开药方。这是西方学术训练的一个忌讳，就是不要指出这个出路在哪里。但是，我觉得，你集合这么多的优秀头脑，大家还是要谈一谈出路在哪里。因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好大的转变，就是它开始觉得要问“怎么办？”像李昌平写的那个书（指《我对总理说实话》——编者注），中央就把他叫过去说，“你谈的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但是你们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吧。”我还听说，黄菊找了一些知识分子谈话，就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谈话的这些东西好像忌讳什么，我们党内开会比你们谈得还要深入，我们连将来一旦怎么样了，‘党产’要怎么去搞，我们都谈到了。”

另外，每当我听到把中国的政治发展的将来的可能性说为什么“苏丹化”，什么“化”，我都会有相当大的疑问。中国政治有一个独特的特点，是任何国家没有的，就是它是四级的政治，从中央到省、到县、到乡镇，每一级都相当大。乡镇的问题就很严重，特别在中部。要说“化”的话，那就是“黄世仁化”。因为乡镇去跟农民收税费的时候，实际上是他自己去讨债。为了讨债，他就要组织打手，就要把那个地方的黑势力动员起来。中国政治的这个层面，是在你那个高层政治现在反映不出来的。

刚才裴敏欣谈到国家能力的方面，原来老是用中央地方关系这个来讨论国家能力。我觉得，这不能完全概括中国这个四层权力的政治现实。举一个例子来讲，你去看中国的财政统计年鉴，或者地方财政的统计年鉴，它的数据是相当的完整，但是就缺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是，地方给中央交了多少税。它有所有那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有中央转移支付的数字，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数字：交了多少税。云南的一个州，红河州，有人去研究，他就把那个地方的财政、税收数字材料搜集以下，可是，在分税制下，国税拿了多少，很简单的一个数字，那个税务局就是没有。我开始也不相信，怎么可能没有这样的数据呢？我要说的是后面这个：如果你去解剖一个比如说红河州这样一个州的话，你会对真实的情况大吃一惊。整个红河州的总产值是 24 个亿，实际上中央拿走多少呢？拿走 21 个亿！就算中央还向地方返还，像红河州这样的话，中央还是从他们地方上拿走了一半。这个研究者他有详细的研究。这就是说，其实国家能力是相当大的，他能够把地方的这些钱拿走。现在研究农村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农村现在的问题，其实是公共财政分配不公的问题。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银行储蓄，把整个社会的资本拿到城市，形成现在说的什么“城市越来越像天堂，农村越来越像地狱”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我作为一个读者，就想知道，它能够维持多久啊？就是这样的下去？

现在正在开十六大，我自己看那个十六大的报告，拜读、学习党的精神以后，我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大家都知道，威胁中国的问题，威胁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可能是环境问题会先于政治问题的爆发，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十六大的报告里不强调呢？只是强调一个经济的增长，不强调可持续发展了（裴敏欣：国家能力并不是片面地看那个财政能力。其实国家能力最重要的就是提供公益品，而环境保护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就存在以经济增长保持他的政治的合法性的问题。

丁学良：我有一句话要讲：你千万不要低估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共领导层对中国社会危机的了解程度。千万不要低估这一点。第二，你千万不要低估他们在收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危机迹象信息方面所花的财力、人力；你也千万不要低估他们是多么地想有人——不管是中国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给他们提出建议和对策。当然，尽管所有这些不要低估，你也千万不要低估他们在对中国危机问题处理的思路方面，有一些他们花足够多的力量也根本不能弥补的致命的弱点和空白。

时殷弘：我简单谈一谈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有一些因素，可能使我们感到有希望，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启动，而且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启动。但是，同时，

我看得比较多的，还是与政治体制改革相悖的那些因素。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定义为一种渐进性的扩大社会民主、扩大党内民主、扩大国家政治制度民主程度的这个过程，再加上一些必不可少的，也许不算在民主的范畴内，但是没有这些东西又不可能有民主，就是比如合理的言论自由，**社会政治权利**，我觉得，有一些因素确实是很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

第一，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中国掌权者一直在寻求代替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能够使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那个路子。在寻求这个代替方面，他们花了巨大的努力，包括现在的“三个代表”。我给这个路子起个名字，就是金字塔型的治国方略。前提就是：最好不要那个政治体制改革，最好能够找到替代品。

第二就是，“六四”事件和苏东巨变以后，形成了一种思想定式、政治文化和政治信条，而这些东西是害怕和不利于政治改革的。如果要是改革，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总是把政治改革在中国的负面后果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害怕，而正面的可能想得很少。一般来说，他们特别注意的是在他们看来失败的事例，东欧的事例，苏联的事例，甚至包括台湾的民主。这当然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政治稳定，也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但是，另一方面呢，经过“六四”和苏东巨变以后形成的这个政治信条、政治文化、思维定式，是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

第三，这个领导阶层，我估计非常巨大，起码有两三千万人的巨大利益群体，他们不自觉地或者自觉地害怕和反对政治改革。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会乱，而乱就会取消了他们所有过去的利益和改革开放以来新形成的利益。还有，不管是第三代、第四代的领导人，政治基础、政治能力、政治能量、政治威望，都是不能跟第一代和第二代相比的。所以，他们总要花很多时间，首先要积累能够进行任何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需的政治能量、政治基础和政治威望。十六大开过以后，新的领导人也要花很多精力在这方面。他首先想到，巩固他的领导，巩固他的权力，建立他的威信，要在高层能够做事情。所以，尽管理论上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从长远来说对这个党、对这个国家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在眼前，他们总是把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放在他们要处理的一大堆问题中，在一个轻重缓急次序中比较次要的位置。一旦等到他们的权力威望都确立起来了，他们认为可以做了，大概对一个领导人来说，对一个班子来说，可能就没有时间了。

但是，我们说，如果没有一个渐进性的，有足够深度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个长远的政治稳定我们是不敢担保的。我觉得，中国有一大堆问题，他们领导人自己巩固权力、建立威望，也有一大堆问题，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同处理眼前这些问题，有个短期跟长期的关系问题。而政治家呢，很少能够真正地把长期性的问题放在一个比较迫不及待的位置。所以，这样一种短期对长期的关系，看来是不利于政治稳定的。也就是说，他们总是集中注意眼前的问题，因此呢，是不是具

有足够的认识，认识到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渐进政治改革，像邓小平搞经济改革那样，花 20 年时间，就要搞这个东西，每天、每月或者每年都有些新东西出来，这需要足够的政治远见，足够的政治勇气，足够的进行政治操作的能力。我觉得，跟邓小平相比的话，现在或者将来可以预见的领导人，在这一方面，包括政治操作的才能，恐怕都不能让人太乐观。

徐成：关于政治改革，我觉得，中共可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比较了十六大的报告跟十五大的报告，觉得政治改革方面有特别大的区别：十五大报告的时候，它把政治改革列为一个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只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方面内容。这里有个基本的判断在里面：要不就是选举，要不就是经济发展。这次为什么提小康社会，那么重要，放到那么头等的位臵？所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他的判断，我估计，就是说，只要我经济还是有一定能力，对老百姓有好处的话，可能整个社会，至少社会的多数还支持他。而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说了，像国光所说的，你一旦启动的话，没有回头路。如果是以民主为导向的政治改革，一旦启动，它根本没有回头路。从十六大报告的结构来看，我认为，它隐含着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在里面，还是要搞经济，来维持他的合法性。（**xxx：我问二位一个问题，如果是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精英是什么态度？**）经济精英至少在目前看来是反对的。你看看台湾，也是这样，台湾现在的经济精英都反对。（**xxx：香港也是这样。**）经济发展同样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专制政权，不管你怎么看。但是呢，另外一些事情告诉我们另外的结论，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和韩国的经验。这个事情早晚得乱。

丁学良：刚才两篇论文，你们两位做得非常好。你们陈述了一个很基本的事实，就是 89 年以前的中共和 89 年以后的中共已经有了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虽然名字是一样的。我特别要把这个强调出来，就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沉重地反思，我们这些人，所谓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了解中国的学者，为什么在很多重要的点上，都判断错了？我是经常地反思这个问题。我说共产党有三大法宝，有一个法宝我很在乎，就是始终在做自我批评。

我现在感到，89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毛泽东之后、89 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还是中国社会的民间的精英们，都有理想主义。这两个理想主义呢，既有重复的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是冲突的部分。89 年的“六四”，终结了理想。终结了理想主义以后，整个中共的领导层考虑问题的

一切东西，都是最后要受到最根本的一个尺子的检验，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掌握、稳定政权，有什么用，有什么影响。不管你讲的是多么好的，甚至长远的怎么样，广泛的怎么样，国家的怎么样，在世界上怎么样，一旦他发现或者他自己感觉到，对党的领导——本来是不可挑战、不可动摇、不可以弱化的——有影响，你这个主意，就是一百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来提出，也没用。因为有了这个考虑，你就看到，他很多的做法、很多的思路，如果在技术层次上看呢，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在 89 年“六四”以前，中国共产党里面，包括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包括邓力群，这些人的目标利益是相同的，他们那时候考虑问题是成体系地、成逻辑地考虑问题。89 年以后不再这样，89 年以后是非常实用性地、工具性地考虑问题。一旦把这一点看透了，他很多事情的做法，就摆脱了一切现成体系对他的约束和束缚。你如果是坐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你看一看中国过去 50 年，再看一看全世界过去 70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能看到多少对他有这种正面的示范的案例？就是说，一个过去有很多镇压性的、通过暴力来掌握政权，而且不断地用暴力来镇压、来维持政权的一个党，一旦它自己改革以后，有哪一个党不垮下来？（吴国光：问题是，不改革的也一样会垮。）能拖一天是一天，它把这个看透了。

裴敏欣：从那个政权本身来讲呢，它是在解决危机。每个危机的解决就像打仗，打赢那一仗，它就认为度过了一个难关。但是，在这个政权内部，有许多能看到长远个人利益、长远前景的人，他们就产生了一种个人危机，认为政权前景不妙。所以，这就可以来解释，为什么最近它出现了大面积的腐败、资金外逃等等这种情况。

时殷弘：我觉得，人很重要。我觉得邓小平是不可多得的，邓小平以后没有第二个邓小平。在共产党国家，最高领导很重要。邓小平可能他哪些地方有犯错，但是他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的思想是改革性的、创新性的。邓小平思想最精华的，不是中宣部讲的什么实事求是，而是他总是在想中国跟这个世界潮流的差距，总是在想我们是不是接近了一点。那个创新性精神，不管一切，我要通过创新来使得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新的出路，这个精神经过“六四”没有了。这是很大的变化。

裴敏欣：在邓小平的个人理念上，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权的集体利益，跟中华民族、

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差距，有，但并不是很大。现在这个局面就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集团利益，跟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完全出现脱节；同时，又出现另外一种脱节，就是共产党内部的精英个人的利益，跟共产党的集团利益，也出现大幅度脱节。这两大脱节，形成它的生存危机。

丁学良：邓小平使我感到最钦佩的一点就是，在他的头脑中间，中华民族的这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时殷弘：如果中共高层领导人他至少愿意把国家利益放到他的头号目标来看，那么今天我们谈的对他有意义。如果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已经把党的利益放到国家利益之上了，然后又把个人利益放到党的利益之上，我想这个会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是学术讨论；政治写作的目标是什么？希望谁来读？你的读者是谁，听众是谁？希望影响中国政治改革，那么一个当然是对社会的影响，另一个是对领导人的影响。从这点来讲，假设你今天是坐在党的这个领导人的位置上，你肯定也是希望青史留名，希望国家的利益、长期的国家利益能够在你的手里得到实现。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在哪儿呢？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利益或者一个巨大的垄断集团的利益，同国家利益出现了冲突。这时候，你就需要协调两边的关系。当然我希望为实现国家利益而奋斗了，但是呢，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现在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很可能达不到这个目标，搞不好身败名裂。我想，领导人他不一定就是说，我今天跟这几个人去斗；他更多的是说，搞不好我自己下台了，那我为什么要搞呢？

我们今天做的基本上是三部分工作：一个是总结，就是总结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这样维持了稳定，保持了发展。这个我想国光 and 老萧的文章都作了非常好的解释。第二个就是，下一步如果不改革，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危机。这个也做了很多。第三个，你如果想改革，你应该怎么改，改革点在什么地方？你怎么通过这种改革实现国家长远目标，又能让你有手段对付现在这个利益集团，这个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我觉得，这一点上讨论得还不够。

吴国光：刚才说我“不开药方”，因为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任何领导人。我怎么想的，我就说出自己的想法，并不去想江泽民看到会怎么样，胡锦涛看到会怎么样，谁谁看了会怎么样。因为当你想设法说服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要想他怎么样才会接受你的东西，这样你的论述方式就会改变，就会影响你说的内容。我觉得，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不必去考虑他怎么想，他会不会接受，

是不是对他有用。如果我们的观察是有价值的，拿出来就会是有用的。为什么不开药方呢？开药方没用的，治病的药他不吃。

李稻葵：我讲两个观点。一个是有关政治改革。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原因是什么呢？看两个地方：第一，我同意刚才国光文章里面的观点，你回顾一下过去 20 多年的改革经历，实际上确实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广义去理解，不能光是强调意识形态的改革，要定义在治理结构的改革。首先是“文革”结束之后，怎么样避免“文革”再次发生，78 年发生的那个老干部退休和废除干部终身制，这是第一次改革。后来到了 80 年代中期，经济改革本身提出了对政治改革的需要，在官僚体制上作出了调整，比如说提拔干部上面，突出了你的政绩，突出了你经济上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广义上的改革。到了 89 年之后，那个时候的危机感是他的政权会不会像东欧一样丧失掉，那是为了保住政权，保底的改革，包括要肃整一些腐化的官僚。那么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他们能不能继续在这个社会里有合法性，有没有代表性，这是一个危机感；再一个危机感，实际上是我准备后面要讲的，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个大的结构性改变。它不是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大部分是民营经济；再一个是依靠国外，对外开放度很大。在这个情况下，私有经济、国外经济对这个党的、政权的一些执政方法，产生了很大压力。贸易依存度在 30% 以上，甚至是 40%，世界上是少有的，少有的这种开放度的国家。这个经济基础在变化，产生了政治上的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我想他们很明确。

第二呢，这次的十六大，我不太同意永年刚才那个观点，虽然从字面上看没有进行太多的政治上的改革，但实际上“三个代表”这个地方，包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把“政治文明”写进报告里面，这个实际上给今后的政治改革铺下了一条很好的路子。

丁学良：刚才郑永年讲的这个现象，启发我的是两点。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并不代表我们社会学意义上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自己就是一个阶级。实际上，这个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而且并不是哪一个学派的经典，而是包括主流学派和批判学派两个都持这种经典性的观点。批判学派最有名的就是吉拉斯的那个‘新阶级’。他就是不断地讲这个道理：共产党自己就是一个阶级，而这个阶级跟历史上我们以前所讲的阶级都不一样。主流学派讲这个的，就是马克思·韦伯。马克思·韦伯跟卡尔·马克思争论得没完没了，但有一点呢，跟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很接近的。他认为，官僚在东方社会里面，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阶级，他们有自己的集团利益，其他的利益都要通过他来综合，他可以有时候起到一种超越各个阶级之上的一个作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韦伯把卡尔·马克思这一点发挥得更淋漓尽致，就是说，在东方社会，尤其是像中国这样

一个社会里面，官僚本身所体现的这个利益啊，往往比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阶级本身，更具有一种自我意识。其他很多阶级对自己的利益，有的时候自己还糊涂一下子；这个官僚集团对自己的利益从来不糊涂，从来很明白。我现在非常想听到的，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到这个程度的话，究竟跟这种古典的、经典的理论所描述的现象之间，除了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很多不同。哪些东西是新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裴敏欣：我先很简单地回答学良的那个问题。现在这个共产党，如果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阶级来看待的话，它跟其他阶级很明显的不一样。任何一个制度当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像现在的共产党这样，那么牢固地掌握国家机器。它必须要和其他阶级进行某种交易或者进行分赃，特别是在 21 世纪初或者是 20 世纪末的年代来讲。我想，刚才永年讲的更重要的一点，是说共产党所面临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内部的腐败的挑战。我们刚才讲过，社会上没有任何其他的精英愿意和它挑战；那么在社会底层呢，没有有足够组织力量的那种社会力量来和它挑战。倒是它内部出现的问题，由于权力没有被约束，出现了现在的糜烂性——就是以前萧功秦写文章讲的，叫糜烂性的腐败。（萧功秦：弥散性腐败。）这个弥散性的腐败，用国家学的概念来讲呢，就是出现一种分散型的掠夺性政权。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医治就特别困难，因为它这时候缺乏自上而下的足够的国家威权力量。特别是，对最高统治者来说，他面临一个很切实的问题：他要整治的那些对象，正是自己要维护政权所需要的那一些代理人。就是代理人的双重性，使得最高统治者很难进行一个有效的控制。如果他要发动自下而上，就是所谓民主参与形式的那种控制腐败的运动呢，他碰到的那个结局可能更惨，会导致改良变成革命，导致自下而上的那种革命性的运动。

吴国光：刚才永年讲到，党作为超越的这么一个东西，上午老孙讲到协调者，他们两个都讲到这个问题。问题是，这个党，它能不能实现协调各种社会利益的这么一个功能？它作为特定的一个阶级，它的阶级意识很强，它的能力我认为也是比较强的。这就可以使得它对本阶级的利益的追求很自觉、很强，协调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它这个协调完全是靠政策调整，根据社会变化的情况来调整，这就需要领导人高度的清醒、高度的紧张。就像你开车一样，你这个路况非常复杂，没有自动导航系统，你要不断地眼睛盯着这个不同的标志，你稍微一出神，也就是哪个地方有一点政策出了毛病，就可能翻车。上午时殷弘讲到这个谨慎啊，确实是，13 年来，他们一旦不谨慎，就要出问题。但是，现在看来，第一，谨慎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第二，就是老孙讲的了，他说现在领导人恢复了自信，而自信以后一般就不那么谨慎了。他现在可能觉得，有点问题，根据过

去的经验，都能够解决了。我觉得，这个状况下，它的政治成本非常高，这些领导人的压力非常大，今后可能不如过去那么稳当。就是说，条件更好了，反而可能不如过去那么稳当，因为他就不那么谨慎。就是说，如果完全靠政策调整，没有制度性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话，就有这样一些问题。

再一个，我还是强调，党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有 6600 万人呐，一个法国这么大，比英国人口还要多呢，放到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一个大“国家”。因此，它本身的‘治理’，就已经是一个大问题。像你们讲的，就社会政治经济利益来讲，它是一个特定的集团。但是，如果说它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掠夺性“国家”，但是它本身是分散的。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它作为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体性是有问题的，它首先能不能把它的党本身控制住就是一个问题。上面想一个问题，下面会怎么样？这一点，我想可能是越来越成问题了。我觉得，功秦兄讲的那个“苏丹化”，也是有这个含义。

底下已经是各自为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用私人的网络来维持统治。（**裴敏欣：利益的极度多元化。**）上午永年讲到，多中心肯定有它的好处。当然，不过条件是这种多中心会促进下一步的变革。否则，它就可能往另外的方向发展。（**裴敏欣：多中心有一个数的问题。N 过大，它就是没法整合；N 如果到一定程度还可以，比如说少于 10 个，那民主的可能就多一点。如果大于 100 个，就麻烦。**）当然也不一定。在这么大的规模里，如果少于某个数字，比如说 N 等于 5 吧，那每一个的量都是很大的，它都足以挑战原来那个中心。如果一共只有 5 个军阀，每个军阀都可以挑战皇帝，都想统治全国；如果全国有 100 个军阀，他谁都不可能有力建立新的大一统专制。问题是，如果你既没有了实际的一体性，也不想走到比如军阀混战，就需要有别的办法。

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回到这个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问题。大家都倾向于认为改革是一个越来越非政治化的过程，发展是在私人空间里进行的。问题是说，今后私人空间当然还有继续发展的倾向，经济在里面继续发展的这个可能性很高，但是，这个社会我们之所以把它概念地区分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是因为两种空间行使不同的功能。那公共空间不是一个盲肠，就在那个地方，有它也可以，没它也可以。事实上，公共空间的形成和运行，对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行使一定的、重要的功能。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这个公共空间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是被党这个特殊的私利集团垄断的一个特殊‘私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那个公共空间行使的功能都不存在，所以这个社会出现很多危机，是单独依赖经济发展来不断地解决问题或拖延问题，但凡有关公共秩序的方面一定都是出现危

机的。这包括我们上午讲到的环境、公共秩序。我觉得，公共秩序可能是一个比环境问题要紧迫得多的挑战，就是好几个朋友都讲到那个反抗的私人化。他没有资源，也不可能动员别人，动员别人一起反抗对他来说代价很大，但是他已经没有什么不可以付出的代价了，那么他就下“毒鼠强”啦，就来一个炸弹，那就搞这个东西。我觉得，根本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公共空间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在他的私人空间又得不到发展的时候，于是就走向那样一个极端。这就是说，如果公共空间继续维持那样一种萎缩的或者是垄断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持续地积累这样一种公共管制的危机。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提出来。我们都讲，政府现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表现的基础上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到底经济的表现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支撑政治的合法性。就是说，它一定是有条件的，不可能说增长7%、8%它这个政权就一定是稳定的，增长5%就不稳定了。从经济表现到政治合法性，中间的转化一定有很多复杂的条件。换句话说，从钱转化为政治，一定要有个机制，不可能说我今天收入多了，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问题是，这个条件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真正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维持下去？我们看到，你的总体的经济表现虽然好，但是呢，社会越来越分化，一部分人得到的财富非常多。一些新左派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反应就是，这会让美国的富人越来越富，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穷国的穷人越来越穷，他就要求国家出来进行再分配。这里提的问题就是说，你的整体经济表现可能很好，但是呢，很多很多的人得不到好处，这也可以完全影响合法性。而这一点，我觉得，对中期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萧功秦：刚才你那个掠夺性的那个词，可以换一个。（吴国光：这是从英文词汇直接翻译的。）太意识形态化了，容易产生很多歧义。我觉得，对现在中国的共产党的发展变化，还是应当从政党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还是三大类。一种就是多元的议会政党，是多元竞争性的党，我们肯定不是属于这一种类型的，也不能用那种类型来比较我们这个东西。第二种类型是独大党，威权政治的，有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其他小党根本起不了多少作用，有一种花瓶色彩的，但它还是合法存在的，像新加坡这样的。第三种类型，就是说原来的列宁主义政党，是高度动员的、高度纪律的、战斗队的、先锋队的这么一个有意识形态作为强大的认同基础的政党。那么现在呢，它那个动员色彩已经没有了，它那个作为一个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对社会进行整合的工具。它没有意识形态那种目标导向，没有那种追求，它主要是稳定政治的一种工具。这个党怎么来形容呢，只能说是“后列宁主义”或者“后全能主义”的这么一个党。

那么，“后全能主义”这个党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基本上没有体制外的挑战

者，没有其他党的挑战者。同时，它也开始吸纳企业家阶层进入它那个体制。实际上，只要体制外的那些企业家进入了共产党的体制内的话，实际上就是出现了党内有限多元化的一个前兆。它肯定要多元，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党内来表达他们的利益，那就是变成党内多元化的一个前兆。而且，存在着地方上的不同的利益的分化，党员当中也有来自不同地方的，穷苦地方、富裕地方，那么每个人发出声音呢，都一定要带着他们本地的或者是本阶层的利益。实际上就是说，那个“后列宁主义”党，实际上它有可能变成一个有限的多元化。在一个大的党的框架内部出现有限的多元化，这个前景还是可以预计的。它出现了，而且它也是符合这个逻辑的，它允许党内民主，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他的声音。这也是刚才孙先生谈到得，就是“三个代表”促使它成为一个在党的框架内总体上作为一个协调者，允许大家表达自己利益。换句话说，‘三个代表’就是：你们声音都表达出来，总体上形成一个总的决策，这个决策是对各种利益达到的一种平衡，那么我们就是代表这个利益。这是一条思路，比较好的方面的一条思路。

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两种选择，两种可能。在一个全能主义党的基础上形成的有限多元化，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党的纪律、党的规则约束了他们的党员，使他们互相之间的冲突不至于激烈到来个你死我活。因为它有党的纪律，那么，这就迫使他们在讨价还价的方式上面变得比较温和，而利益表达又实现了，又没有剧烈的利益冲突。最后从中央的角度使得各种声音来一个总和、综合，形成一个决策，大体上可以反映各个阶层的利益，在讨价还价的机制上面达到一种综合。这就有点像是中国特色的一种议会政治。议会政治就是多党嘛。它就是中国特色的议会政治，这是一种可能倾向。另一种可能倾向呢，就是党内的游戏规则不足以强大到对各种利益互相之间进行整合，党内矛盾借助于党内民主这个旗号争斗。你也是共产党，我也是共产党，但是大家争得你死我活。而且，在我们中国政治的文化当中，又没有一种讨价还价的政治文化。我们中国没有那种契约性精神，就是家长制的一种精神，在家长制这个系统内部要搞这种东西有相当的困难。也就是说，这就变成一个大的框架里面的一个有限的多元失败。本来呢，这个东西不需要在大的框架里面，你就是允许其他的党存在，那么它是它的规则，我是我的规则，最后是互相讨价还价。有一个大的框架，这就是说，我们原来的制度规则有没有可能来整合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孙立平：这里实际上讲到对“三个代表”的两种可能性的理解。一个是从它代表着极权主义含义的意义上理解，还有一个是把它作为一个协调的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理解。我觉得，从第一个可能到第二个可能，是实现政治转型的一个途径。但是，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现在不敢说。接着萧功秦的说法，我补充一个问

题，就是说：如果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党往哪儿放？这回到永年那问题，就是说，如果把党理解成一个集体皇帝或者有组织的皇帝的话，看刚才萧功秦讲的这种前景，那么党有没有可能处于一种君主立宪当中的那个君主位置上？这是一个，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现在很多朋友都讲到，这个党和现在这个经济精英集团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说，这个政治体制的可能的潜力，实际上看党怎么处理和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假如说，它和社会的关系，具体包括了它和精英的关系、它和民众的关系这两层关系的话，那么可能影响到未来 5 到 10 年的政治走向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和精英的关系，就是它怎么处理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现在看，这种建构的过程已经在开始，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结果，甚至看不到一个可能的前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探讨它的可能性。如果说民主就是对决策过程的影响，那么，拿到中国来说的话，从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来看，确实没有民主。但是呢，它决策的东西总要执行，中国对这个东西的影响主要是发生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么看的话，我觉得，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党和这个资产阶级建构关系的过程就已经在开始。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权贵集团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国家的自主性的下降，另一方面是这个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能不能看作是一种变形的精英民主政治？就是说，精英这个群体，它现在一方面在开始影响直接的决策过程本身，更多的还在影响政策的执行过程。比如说国有股减持的事情上，就是这样。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在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以权贵和这个党两者为主体的一个变形的精英民主政治的形成？而下一步，这个变形的精英民主，它可能会走向一种正式的民主呢，还是可能固化为一种权贵的统治？

胡祖六：“三个代表”，从经济角度看，还是很有积极意义。尤其跟过去 50 年共产党实行的那种意识形态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共产党从根源来说，是代表工人阶级，代表工农，从意识形态上说就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妨碍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或者叫民营企业家的兴起，使经济停滞。现在共产党在探索新的社会、政治还有经济的格局。就是说，“三个代表”把以前革命党提的那种所谓社会主义改变了。它没有根本放弃，从长期来看没有放弃这些东西，但是同时又对于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的兴起能够兼收并蓄，讲一个妥协，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务实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冲突。尤其是简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两种利益，并不是完全能够相容。目前这种妥协，要把这两个东西糅合在一起，可能很困难。但是，只要是努力的话，它还是能够做到，两者看起来很矛盾的东西能够共存并处。一方面，不要让工人农民的利益太多地受损害，但是我也不想

去损害这种新兴的私营企业的利益，使他们没有空间去生存、发展和壮大。这个效果就是经济的比较持续的快速的发展，结果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兴起。随着中产阶级形成，也就为他们说的那个“代表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空间，因为中产阶级不止是物质上有这种财富。按定义来说，你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或者至少有机会、条件受比较好的教育，才是中产阶级。他对各种文化，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西方文化，欣赏能力大大提高。现在看来它有冲突，但客观方面，它能够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把中国经济这种最有活力的部分发挥、动员起来。

(萧功秦：您的意思是，在权贵凝固的这种权力化以前，它那个党内有限的多元化以后，有可能先过渡到有中产阶级这个因素的加入，使得这个避免那种凝固化的权贵式的那种东西有可能。)

你想，传统的共产党、革命党，它代表的是工农。这实际上当然没有达到，是空的，至少它说的理念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另外一种极右政党，它们就是代表最富有的资本家或者说那种特殊权贵的利益，完全不顾工农、普通大众的利益。这是两个极端。就象在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企业的利益，民主党代表工会的利益。但是，事实上，过去 20 年来，即使在西方，也在往中间走，不像以前那样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是吧？那就是说，走中间派或者中间主义道路。我想，现在这个“三个代表”的意义，使共产党跟这个 20 年前、30 年前的国民党相似。国民党代表地主、资产阶级，但他最早这个三民主义的理想是融合大众的，而实际意义上讲它代表很多国家资本。最后国民党还是把这种东西糅合起来了，实现了它的经济发展。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也好，有没有意识也好，发生了社会的转型，还有政治的转型。

时殷弘：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有很大的变化，国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管不了 13 亿人，所有人的吃饭问题，所有人的生活问题，所以国家也不可能把他们包下来。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权力已经大大缩小了，社会主动性大大增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怎么来治理这个社会？我觉得，江泽民，至少是邓小平以后，有一个很清楚的思想，就是这个社会我不可能全部管住，不可能是每一个工人都有正常就业，不可能保证每一个农民的收入，但我至少要管住，第一，军费；第二，3000 万公务员，我加工资，我不担心。就是说如果发生问题，至少有这么 3000 万人听我的。还有一个就是军队，还有这个党。

党呢，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精英的党，增加知识水平，增加它的现代化的能力等等。江泽民之所以提出“三个代表”，他是把这个东西作为党的建设的路子。我想，共产党再怎么样扩大基础，它也仍然必须是一个党，必须是一个有生的政治力量。这个有生的政治力量有 6000 万人，也不可能每个党员都管到。

很多党员管不到了。不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现在党与国家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党的建设如果要确实可行的话，也要搞这个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可能管到每一个党员，他们能够有这个大体上有过得去的素质，我不可能使每一个基层组织都发生作用。当然，要抓党的建设，最关键的是要金字塔模式。金字塔模式就是抓这个共产党自身内部的金字塔治理模式，抓要害阶层，抓要害部门。哪一个要害部门，哪一个要害阶层？比如说，军队。江总书记当军委主席以后，军队就是六个字，“打得赢，不变质”。当然，军队改革它也没好好做，但是，十六大军队代表的发言，已经把军队的改革正式提出来。过去不敢讲军队的改革，是吧？军队要抓住。中直机关，国务院，中央办公厅，这个党的建设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性的省市——关键性不一定就是经济——比如说新疆，要管住，西藏要管住，当然还有上海、北京、沿海。还有呢，关键性的经济部门，银行。银行党的建设要抓，银行这个党一定要有战斗力。还有其他，比如高教部门，新闻。要把这些管起来。怎么管？就是关键的时候，要到出问题的时候，就要“讲政治”，讲高度统一。你看，共产党只要一出现这种事情，马上就是讲“核心”，讲全党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去年江泽民到国防大学演说，把军队骂了一通，说你军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绝对不能有自己的声音。还有，尽最大可能要讲廉洁。因为它也知道，一方面要给经济好处，但是如果真正是党的要害部门，国务院、中直机关、军队太腐败，这个党要垮台了。

讲到全民党，我觉得它面临一个问题。共产党可以代表很多很多的利益，比如军队的利益、国营企业的利益、乡村基层组织的利益等等，但是共产党它要在中国统治下去，它还要讲：多元化当中有不同利益集团，集团利益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统一。为什么要有党，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就是一定要有统一，在最关键的政治问题上，所有各个山头、所有各个局部利益都必须听党中央的，而这个党中央呢，它一定还要有一个有点共产党色彩的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三个代表”大家讨论非常多，但是请注意，“三个代表”只是党的信条之一。“三个代表”的功能是扩大基础，共产党还有其他信条，比如说，民主集中制，党的高度统一、核心，全党要听中央的，等等，那是不变的，绝对不变，特别在社会多元、党内利益多元、国际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反正只要共产党存在，肯定有人骂你；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在关键问题上，它一定要保持党的一个凝聚力。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比如什么“三讲”啊，它有个功能，天天讲，就是你不要忘记还有个党。你可以为你的局部利益谋利益，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个党。我觉得，资本家入党，15年之内，它不会成为党内一个非常强大的集团，党的那个现在有的机能还有。江泽民最近老讲党的建设，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三个代表”不能取消这个。这里有一个因素，还是‘人’，就是党的领导者、领导层，他们的能力和意志。就是一个政治集团，甚至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面，没有监督力量，没有这个补充的

情况下，它慢慢慢慢会变成软的，到那个时候就管不了了。所以，他江泽民很着急这个事情，就是党的建设。我觉得，党的建设要成为可行的话，如果要我提一点政治建议的话，就要建议中央：全党问题很多，一定要抓要害部门，抓要害阶层，军队、中直机关、关键省市、关键经济部门、高等教育、新闻，不管什么“三个代表”，代表什么全民，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统一意识，出大事的时候要全党听中央的。（孙立平：这个思路是强化“支部建在连上”。）也不是“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哪个连上？中直机关、军队，它共产党如果还是想存在的话，要整治这些地方。就是说，不但要加强他们的知识水平，不但要加强他们的年轻化，要整治这些地区、这些关键部门，要加强这些关键部门的某种程度上的集中统一。我想，可以做到。（孙立平：上海在社区建设当中，特别把社区党建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根据我的猜测，这里有没有一个党的属地化的意向？）党可以属地化，党可以有甚至日本自民党那样的派系，但只要这个党还想在 13 亿人口的中国存在下去，关键问题上它一定要讲集中统一，一定要讲全党听中央的，中央听中央主席的。（孙立平：这是一种很极权主义的模式。）

当然现在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实在太多。这么多基层烂摊子，烂掉的很多很多。（郑永年：你讲的是说共产党怎么样维持它的生存，维持它的政权，那我们要讲的是，你这个基础，是不是、怎么样有一个进一步的民主发展的方向。）（裴敏欣：真正朝一个现代的政党发展。）我知道。在中国，我们现在不可能马上就可以看到有其他人、其他党来代替共产党。共产党要做的话，它总是两手，一方面要扩大基础，另一方面要把这个党搞搞好，而这个党呢，现在太大了。（吴国光：这个意思是进一步缩小，6600 万也象一个国家，对它你也不要以前那种办法了，你就要这个领导集团。）中国如果你要什么党要现代化，国家要现代化，如果我们现实一点的话，基本上还是要靠这个共产党。它如果要能做的话，它必须有最起码的凝聚力，最起码的意志，最起码的能力。而这一点，如果没有一个所谓比较好的金字塔上面比较能干的那些个人，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它要这个社会比较稳定，它至少要保证 3000 万人跟着它走。

徐成：我先接着刚才大家讲的这个讲，先从十六大它的这个意义来讲。我个人对十六大这个“三个代表”写进党章，有两句话的判断，就是：评价很高，但是期

望不高。为什么评价很高呢？借老时的讲法就是，中国如果今后不讲政治革命而讲政治改革的话，谁最有能力推动政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要推动政治改革，是因为它自己的政党转型，就是在它最有自信心的时候。如果它认为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实现民主转型，它一定失去政权，它一定不改，危机再大它都不会去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十六大评价非常高，可以说它为共产党自身的政党转型，在党的建设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把共产党跟国民党比较一下：国民党过去也是党国体制，但国民党实现了从党国体系向宪政体系的转型，国民党自身从一个国民革命型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一党支配型的政党。那么，国民党能够有这样的变化，优势在哪个地方？两个方面，一个是意识形态，弹性非常大，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对民主、宪政、自由没有排斥性；另外一个它的组织弹性很大。共产党呢，恰恰这两条不一样。而“三个代表”恰恰为它自己的未来这方面的发展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像老孙提的一点，他说看怎么解释“三个代表”。如果说未来共产党要转型，从解释上，他就可以从“三个代表”找到依据了，而过去那些里面它找不到。“代表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民主、自由、宪政、人权都是先进发展方向；“代表最根本的利益”，是从它这个角度来扩大它的社会统治基础，使它更有信心，使它的这个意识形态更有包容性。这就为未来这个党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在党建方面，十六大的意义非常之大，这是一。如果说政党整个转型，它还可能推动改革，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它积极意义非常高。

第二个呢，期望值并不高。为什么期望值并不高？就是说，它虽然有这样一种转型的可能性，但是它没有往这转型的一个动力。至少从现阶段来看，没有这个动力。为什么这么讲呢？刚才大家也谈到了，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它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形成一个你叫阶级也好，叫阶层也好，叫利益集团也好，它有它自己的利益在里面。那么，这个利益是建立在它对整个政治权力的垄断基础上形成的。那么，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如果要领导这个往前走，他必然要保证在新的宪政体制下，或者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这批人的利益得到保证，他一定要有饭吃。就像过去的江湖老大，你如果要让你手下洗手不干，你一定要给他找个出路。目前来看，它第一没有动力，因为从内部的来自改革的压力、转型的压力不够大。随着它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如果把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拉入党内，它是不是更没有动力了？第二个，压力也不够大。我们看各个国家民主转型，真正的属于中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来自于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和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它会有要求。目前中国没有这个压力。目前，党也好，国家也好，这个官僚利益集团掌握的资源，远远的是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而中下层也好，弱势群体也好，他们不构成政治力量。作为一个政党，我提出转型，我必须考虑在这个改革过程中谁获益。现在呢，获益的人掌握的政

治经济资源太少，而利益受损的人掌握的政治经济资源太大了，所以没有人会提出来要搞民主改革。所以，十六大之后虽然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也好，什么什么也好，不要在转型问题上过高地希望。

那么，改革的动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预期的改革动力来自于何处？我觉得，不能简单地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去找它的动力，要从国家体制内部去找它的动力。我一直这样认为，改革可能出现的地方，更多的来自国家体制的矛盾，而不是来自主流社会的压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从失败的角度来讲，一个要改革现在体制的人，如果说这个政治系统足够强的话，他就无法推动改革。最典型的例子是朱镕基。朱镕基我们可以批评他的经济政策有些计划经济色彩啊等等，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他对民主体制是持肯定性的，这从他回答外国记者可以看出来。他对这个官僚利益集团的腐败也好，掠夺也好，他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玩不过这个东西，他面临巨大的组织化利益集团。所以，如果简单地让一个改革者去干这个，他肯定不会干，因为他最终可能被这个利益集团所抛弃。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目前改革已经出现了一种国家内部、体制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恰恰是改革的动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它的合法性是在这个经济绩效这方面，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东西，使得它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改革。91年到92年大家非常悲观，我当时说这样一个僵局是不会维持下去的。为什么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来自社会的改革推动越来越小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城市，工人的利益，尤其国有企业的工人利益受到损失；你如果行政体制改革，巨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受到损失。一步一步的改革，制造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相反，支持者的声音越来越模糊，因为大家不知道改革之后谁会真正地获益。从这个角度来讲，来自社会的压力会越来越小。但是，为什么出现了92年邓小平讲话，出现了92年之后的新的改革浪潮呢？就是恰恰来源于它内部，国家体制内部一种矛盾。邓小平的价值在于他引入市场经济，而这之后这个体制无法再倒退回去了。你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你就要让现在这个体制运转起来；只有市场经济体制运转起来，你才有税收，你才能保证就业，你才能保证稳定，保证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是你合法性的基础，所以你要满足这个，让市场经济运作起来，必须满足它需要的条件，你产权必须明确，你法制必须健全，你等等方面的东西。这迫使邓小平看到这个趋势。当然不是说一定会有一个人，但是恰恰是有这样一个人，他在这里面起了一个推动性的作用。

今天来看呢，这样一个逻辑还在中国的改革中起着作用。恰恰是经济改革，给它这个内部、国家体制内部的改革提供了很大的动力。比如说，加入世贸以后，现在立法非常多，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等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对整个国家建设这个角度的强化，都是必然的。这是从负面的压力来讲。另外一个就是腐败的压力。腐败本身一个方面失去政治合法性，一方面失去政治效率、国家能力。

从这个角度讲，它要求建立这个过程。但是，建立这个过程是不是一定排斥社会力量呢？不一定，它有可能是吸引社会力量的加入。我觉得，中国真正选举也恰恰是为了要加强国家能力，但是以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来加强。因为压力，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国家体制内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要有反应。第二个，从改革到今天，我们仔细看看，国家层面来讲，它里面出现了很多的矛盾。首先，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过去党是代表一切的，政府的力量很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作用起得越来越大，更多的权力放到政府机构来了，那么党实际上一方面就是一个人事权，还有一个大问题的把握。比如说，很简单的，打官司，拿着党的文件到法院，法院是不认的，它没有法律效力。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时候，实际上很多地方产生了市长、省长和书记之间的矛盾。如果县长、市长这些人的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话，往往会影响到利益分配。所以，共产党它现在也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权力的重复问题。

还有司法。公正的司法效率的提高，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因为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经济。另外，司法系统本身它是一个利益集团，它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它要提高它在社会体系中的作用。你看看那个最高人民法院的5年改革纲要，它那个未来司法体制的改革，远远超出了共产党组织系统所能承受的。另外一个就是人大。这些年来，其实人大的发展也很大了。沈阳人大否决了法院的工作报告，陕西省有个地方的人大否决了政府的工作报告。它也有内在的一些压力。另外一个，中央地方关系。过去是一个分权模式，从目前来讲这个分权模式还会继续下去。为什么呢？这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次十六大，我觉得，除了个代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就是这个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是往地方自治型或者分权在进一步。这还是第一步，那么还有预算权、举债权等等这方面的权力，随着这个发展，地方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这个体制又出现了一个困难，它出现了一个上级对下级失控的问题，就是对它的地方代理出现失控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内在要求有继续放开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出现了一个代理失控的现象。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简单的就是集权，简单到它已经认识到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要通过政治上的改革或者国家建设这个层面的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范围，怎么样重建国家机构的权力。比如全国人大，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通过哪些机构，来对地方不合国家法律的法规、规章进行取消、监督。这个现在没有，它现在意识到问题很大了，要讨论怎么样建立宪法监督。江泽民也曾经提出来，怎么建立一个宪法监督机制问题。它内在有这个需要。（**裴敏欣：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党的地位问题。**）对，问题恰恰在这儿呢。一个是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监督，这是地方分权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中央不可能放手。第二个前提，就是让地方政府更

多地对地方人民负责。我们看到，各个国家为什么要分权，是因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服务于地方老百姓。如果没有地方老百姓的举手机制的话，大皇帝变成小皇帝，后果更糟糕，而且后果是中央来承担的。因为共产党国家，大家骂的是共产党，不是你地方政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必然要进行改革。这些东西都不是来自共产党想搞民主，而是因为它内在的、体制内在的危机让它必须往那方面走。而它一旦走下去呢，就停不下来了。就像村民自治，它一定产生压力。一个是对村党支部产生压力：你不是选举的啊。包括现在出现乡一级选举，如果没有村委会的选举，他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要求。所以，我觉得，由于国家体制内部矛盾、为市场经济改革方面产生的这个国家建设的要求，必然会在某个阶段上引入社会力量；未来中国改革更多地可能来源于这个。它是一种被动的对危机的反应，而不是一种主动的对民主的追求。

丁学良：我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十六大召开，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有一些很重要的提法、做法，包括“三个代表”这些东西在内，包括江泽民这个第三代领导人、常委全部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当然，如果以我们在海外受的教育或者受海外政治观念、政治架构的影响这个标准来看，当然可以提出很多的批评。如果横比，其他那些国家已经到那种地步了，你那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但是，问题是，竖着比一比呢，跟中国共产党自己过去的一些交权的方式，跟中国以前历代王朝的政治表现，确实还是一种进步。

第二个呢，我想说，从十六大这个交班的事情上啊，我就联想到 1989 年前后的中国的高层政治。我发现，任何一个事情，只要是打到了痛处以后，它一定会创造好的结果，只要是不把人打死——打死了就完了。89 年“六四”那个事情，打到了中国的痛处，把中国的上层和社会都打到了痛处；因为打到了痛处，又没把它打死，所以最后它还产生了一些好处。产生哪几个好处呢？第一个，它在中国的统治精英中间产生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感觉。这种患难与共的感觉，从直接的政治的操作面上来讲，就使得他们——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少利益上的冲突，有多少人事上的冲突，有多少大堆乌七八糟的我们搞不清楚的事情——认识到，他们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和生存危机，这时候他们能够把他们内部的这些严重的冲突放在一边，找出一个办法，先把这个火扑灭。好几次都是这样。给定这一点的话，那么，对下一步中国的政治发展，在中长期内，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说，下一步中国的社会、政治如果有重大的变化的转机的话，它不大可能来自于统治精英的自主的选择，也不大可能来自于这些统治精英之间的内斗过分，失去控制，这两个都不可能。（时殷弘：“六四”以后，共产党高层他们不会斗。）还包括出现理想主义的，就是说非常开明，但是有可能造成一些失控局面

的。它不可能造成统治精英内部斗得没完没了，即使出现一个危机，也不管，不去处理这个危机，还在斗下去。这两种情况，在中期之内不大可能看得见。给定这个情况的话，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随着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哪怕它走的实际步骤远远达不到它表面上、宣传上所许诺的那种程度，只要它大概地朝那个方向走，也可能走两步、缩一步，总之是说要拓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里面的社会基础，同时也要拓展中国共产党在政策的层面上能比较多地反映比较多的社会中间阶层和富裕阶层的这些利益的话，只要给定这两个前提，那么，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以后这个大的框架，仍然有希望在比较渐进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那些不同的经济利益代表——不管是叫“派”也好，还是叫什么东西也好，这肯定是会存在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性。

第二个重要的可能性呢，我现在有点吃不准。当然，这个话题讲得太远了：你看中国过去好几次重大的王朝变更，都是中原王朝严重地腐败。中原王朝把中原地区统治得非常好，控制得非常严，但是中原王朝腐败，结果被一个来自于边缘地区的异族——以前叫异族——给它打进来，造成了王朝的变化。你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为止。唐、宋以后，元朝把一个非常成熟又腐败的宋朝给打掉了。打过以后，中原地区的这个危机意识重新被认识。明朝然后又统治中原，很成功地统治中原那么多年，然后自己又腐败下去了，然后又被一个来自边缘的清朝给打下去了。国共两党打那个内战啊，实际上，如果没有日本人在中原地区的侵略的话，那个内战的胜负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是因为外来力量，对不对？假设没有“9·11”这个事件的话，美国对中国巨大的外部战略压力，有可能导致这个政权垮台。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成功地统治中原，最后呢，你就受不了来自于外来的危机因素的输入。现在看，这个过程得到了缓解。能缓解多少？不太清楚。（吴国光：我觉得台湾问题和你刚才提的问题有关联。第四代领导人都是技术官僚，在台湾问题上它可能没有能力创造出新的思维，只会沿着邓小平那个“一国两制”走，而这是过时的口号，不实用的口号。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如果台湾方面有什么动作的话，他们会是什么反映？）我们必须更多地看到中国这个政治棋盘的边界啊。

裴敏欣：许多问题，还是要回到政治改革。因为从国家对外政策、国内经济政策、社会问题，都跟那个体制内部的政治问题直接相关。那么，我们现在就围绕一个问题，每人三分钟，就是：现在搞政治改革，内容是什么，是会促进目前的政权稳定、加快改革呢，还是会加速它的不稳定，甚至就是说垮台的可能？

孙立平：我觉得，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顺序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对顺序问题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顺序涉及到时间，又和政治周期联系在一起。李慎之对江有一个批评，他觉得，江在开始的时候无所作为，这都无所谓，但是到了你真正掌握到权力，而且各方面的条件也都非常好的时候，你该做的事情你都不做！这个批评非常中肯。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你是小媳妇，你不作为，那么别人无话可说；后来你真正掌握了权力，你又认为你当时的情况不错，这时候，你应该作为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家，你应该做的那些事情，你必须得做。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问题本身的严重性到什么程度，而是说，你选择的顺序究竟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智慧的问题。我觉得，这里发挥智慧的余地其实非常大，但是他的作为本身逐步地缩小了这种智慧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比如说，90年、91年的时候，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你完全可以说“六四”就是“反革命暴乱”，坚决不能平反，但是把陈子明、王军涛这两个人，第一步先放出来，然后给你弄一个西城区政协委员当当。（插话：你是只做不说嘛。）是啊。假如说，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某一个时刻，你用了这种方式，一方面，坚决不能给它平反，另一方面，这么搞，你说这个各种力量，包括国内、国外的各种力量，是一个什么评价？

丁学良：会重新定位的。我给你讲一个事情，使我感到有点希望的。1998年，也就是香港回归以后的第二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和非常核心部门的人在一起。他说，“假如现在中国政府对那个魏京生啊、王军涛啊这些人，海外这些民运分子，让他们回国，但是呢，他回来以后，不要参加颠覆政府的行为，让他们去到那个很边远、很贫困的像贵州啊、青海这些地方去，当一个乡长、镇长，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我说，“这个想法很好啊！”

孙立平：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都可以做，也还可以。第三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关于台湾。我觉得这确实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讨论清楚的问题。两口子明明在闹离婚，老婆就说这丈夫长得太难看，那我就跟他离婚。丈夫说，你说我难看，我去美容行不行？是不是就不离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他确实美完容之后，“美”得还不错，她还离不离？（时殷弘：这个男的还担心，我一旦美容，然后她还跟我离，然后人家都知道了，骂我傻。什么什么，他很多顾虑。）对。我觉得确实很复杂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认为，美了容之后，对于解决问题有帮助，使问题有一种简单化的效果。在台湾这个问题上，你

比如说民主化，这是一个美容吧？它至少可以使问题简单化。你不是说，你只要民主化了，就可以了吗？（插话：邻居都会同情你：你都美容了，她还跟你离啊？）是啊。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说，你只要实行了民主化，台湾 99%的人就赞成统一。但是，这至少可以使问题大大地简单化。

萧功秦：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考虑，基本上还是“制度决定论”的模式。就是说，有一种好的制度，只要把这个制度搬来，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制度 A 能产生效果 B；我们需要效果 B，所以我们把制度 A 移植进来。但是，制度 A 产生效果 B 在西方是可能的，因为它有一系列支持条件；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和上海的一些高层的管理人员，包括一些领导人员，开座谈会的时候，他甚至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中国搞民主有什么风险？”他们实际上心里也认识到民主这个潮流是不可违背的，对他们的合法性，对解决中国的问题，对防止腐败，对凝聚人心，国际潮流。我想，对技术官僚来说，他们原来那种意识形态大概已经没有了，主要的是考虑到一个操作问题。那么，从操作问题的角度、风险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也要设身处地为他考虑一下。第一，在那么严重的腐败情况下，你如果搞大开放，搞民主，那么实际上起了一个对他们妖魔化的作用，就是他们整个的那个形象就大大破坏了。如果大家都很廉洁，那么他不怕；现在基本上人人有一些贪污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

第二个，就是地方主义的问题。这个地方主义的严重性，因为你是为老百姓负责，如果是县一级搞民主，那么县里面就不听省里的话，因为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何必要听你的，我是为选民负责。如果搞到省一级，省不听中央的话。如果搞到乡一级，乡不听县里的话。这就会形成它的整个整合发生困难。而且，在目前阶段，这个威权政治，还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控制社会的形式。因此，它觉得这会造成它的统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第三点呢，就是说，地方已经形成大量的土皇帝，已经出现“苏丹式”的政权。那么有“苏丹式”的这种情况下，本来至上而下的控制，是克服“苏丹化”的一个手段，如果民主化，它就是合法化了，你没有资格控制它了，我是选出来的，它土皇帝就合法化了。这样几个因素合在一起的话，就使它觉得这个风险很大。再加上其他因素。菲律宾搞民主，俄国搞民主，台湾搞民主，党就没有了，它有这种担心。所以，它处于一个两难状态当中。在这个两难的状态当中，中国的民主到底走哪条道路，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它也确实感到民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出于两难问题的困扰。因此，在目前这个条件下，我觉得，主要还不是通过强大的抗议运动来实现民主。我觉得，还是路径依赖，就是按照共产党原来

邓小平开始改革的模式，如何从这里面开出一条路来。（裴敏欣：但是，共产党国家，到目前为止，真是没有成功的例子。）

孙立平：我插一句：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需要具体分析。它那个不变的那些理由，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确实是，你这么搞了，可能就有个坏的结果；第二种呢，其实不见得是那样，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找的一种借口；还有一种，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就是人们长期承受这个东西，承受的太多了，就变成了一个吓唬自己也吓唬别人的伪问题，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对这个问题坚信不疑。比如说稳定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太笼统的问题。这里可能包含着不同层面的因素，有的可能确实会造成这样层面的不稳定，那样的不稳定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但不一定会造成那个结果。自己编出来，把别人也吓坏了，把自己也吓坏了。

萧功秦：我再讲下去。我考虑，从它那个思考逻辑当中，是不是可以引出一条道路来。我自己提出四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说，那个民主制度在整个威权政治当中，具有某种有效性、有用性。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解决它的一种问题。只有它觉得，这个东西的建立，或者是村民选举，或者是党内民主，或者是这个民主制度的创新，具有解决它现在面临问题的一种有效性，它才有动力。否则它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有效性的问题。第二个原则是可行性。有效的同时它要可行。就是说，这个东西创出来以后，在它的集体操作当中，和原来的那个还能整合起来。第三个原则是可控性。它可以把这个制度创设出来，同时，它觉得走错了的话，它还可以收一收。进两步退一步，它能够产生某种主动性，或者主动性的这么一种自我感受。客观上可能走了第一步，就不能退第二步，它自我感受上还是有可控的。第四个呢，就是合法性。就是说，在它的意识形态解释当中，这个东西也不一定要违反共产党的原则。目前看来，因为出现了“三个代表”，和原来的那种比较僵化的基本原则、思想相比的话，它的这个合法性可以容纳进来，在意识形态解释当中可以容纳进来，是全国人民代表利益啊，什么先进文化啦。（孙立

平：还是太笼统。共产党还有哪些原则？）我考虑，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目前这个条件下，自下而上的抗争运动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实际上，根据我对清末改革的一个理解，那个地方主义和腐败问题，以及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恰恰是和那个地方选举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巨大的贪污膨胀，使得整个转型发生困难。因此，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也许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丁学良：我讲几点初步的判断。第一个是说，无论是从主观的价值的认同，还是从他们个人的实际上的政治的意义，包括权力的保障，包括家族啊这些东西都考虑了，我都看不出来，十六大以后，中国的领导层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意愿，看不出来政治改革的具体化的一些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这个改革要能够起来的话，改革都不是在人过得下去的情况下出现。很少有人冒这个风险去改革。改革只是在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客观的压力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在领导层中，又出现一两个敢于冒风险的，同时还能够找到一个切合点，把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利益，把他这个执政党的利益，以及在他看起来这个社会和国家整体利益，他觉得可以找到一个融合点的地方，这个改革才能够启动起来。现在看，看不出来。就是说，对今天共产党的领导者，89年在中国或者前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对他们具有深深的震撼性的效果，到现在为止对他们都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认识，现在他们不至于去冒这个风险。

虽然讲了这样一个对政治改革前景悲观的说法，我还要讲一个比较正面的判断。给定我们绝大部分人认同的那种政治改革不大可能短期或者中期内在中国出现的话，但是，我认为，十六大以后的中共领导层，会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继续地朝前迈进。这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政治和行政制度的合理化”。这个合理化也不是我创造的词，我只不过是用在对中国这个分析当中。我特别强调这个政治和行政制度的合理化。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很重要的步骤了，比如说，选拔干部的时候重视他的教育。这个原则，落实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偏差，包括有些学位是假的也混进去了。包括选拔干部的时候要注意年轻化，要注意实际的政绩，包括对财产、智慧或者知识或者其他方面具有优势的社会精英层，执政党给他们开了一个比较大的门，给他们一个适度的参与决策过程的进入执政党的这些渠道。这种合理化趋向，会延续下去，而且会在有些方面取得一些比较实在的成果。因为中国现在加入WTO，中国现在是外向型的经济，中国社会里面现在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中央政府以及省市一级的政府都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垄断解决的途径和解决方法。这些现实的困难，都会迫使这个政府在政治和行政制度的合理化方面迈出更多的步伐，包括制定法律，制定行政法、诉讼法等等，包括在艾滋病这些领域里面，让国际上有更多的介入和参与。我觉得，在这些方面还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是在政治和行政制度的合理化方面，中国的十六大以后的领导层，能够逐步地迈出更坚实的步伐，而且这个方向走得比较多的话，它在短期之内仍然不具有我们所认为的政治改革的那个效果和价值意义，但是在中长期看来，会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建设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东西。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我现在这个政治态度，我觉得，如果说在政治的合理化方面能够有逐步的进展的话，会为以后，中国社会里面如果出现了来自

于社会中下层的足够的压力和足够的挑战的时候，假定那个时候的中共高层也许会出现一两位像以前的那种领导人一样，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把这种社会压力和抗议转变成政治改革的一个契机。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行政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既成事实，能在有些方面有比较多的适应性，来使这样的任务变得不至于风险太大，难以控制。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孙立平：我非常同意老丁这个判断。广东最近搞“政务信息公开”，它跟以往的其他地方搞的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政府有意和无意隐瞒信息，你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来控告政府。从这个角度，刚才我从老丁那儿听了，受一个启发，就是说，很可能，我们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或者其他的改革也好，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一种技术化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公开性、言论自由，原来人们想象中就是放开报禁，放开党的电视、广播等等。但是，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报纸是垄断的、封锁的，电视是垄断封锁的，但是政府办了很多网站，大大加强了信息的这个单方面的传播，增加公民对政府运作的了解。从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说，可能没有重要的进展，但是，这作为公开性的一个方面，又确实有技术上的、实质性的进展，我觉得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国光：我给政治改革下一个定义的话，就是：权力有所制衡，参与有所扩大，达成这种目标的改革就是政治改革。为什么提这两条呢？是相对于目前的这个权力架构的特点，就是集中和垄断。制衡是从内部发展一种对垄断的打破，而所谓参与则是从外部对垄断的一个打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定义政治改革。这样，政治改革可以体现为比如说法制改革。如果立法过程中具有这样的内容，那当然它是政治改革；即使是一般的哪怕非常技术性的措施，如果有这个内容，也是政治改革。否则，你再大的动作，也不能叫做政治改革。

我觉得，有五个理由，对未来的政治改革前景比较悲观。第一个理由就是领导人的层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我一直是这个看法：从“后八九”的高层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在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没有巩固的时候，他没有能力推动政治改革；当他权力巩固了以后，他没有意愿来推动政治改革。他觉得已经权力巩固了，你还要让权力受到制约，那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吗？当你没有足够权力的时候，你去制约谁呢？你要制约人家，人家还把你赶下来。我觉得，他们接受了原来的领导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的这种教训。

第二个层面就是民众了。现在的民众出现了利益分化。一些人是求稳定，这种稳定是短期稳定，你很难设想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从做生意也好，从别的方面来讲，他求稳定。你动一动，不一定说你要民主化，他就认为带来麻烦，增加不确定性。动一动总是引起麻烦，中国人老话，搬家还要好几天乱七八糟呢。所

以，他就不愿意动。另外一些人呢，不满在积聚。在不满积聚的情况下，一松动就可能爆发。这不是说就不可能动；这个动的时候就需要更高的技能。一般的锅，你掀开就掀开了，那高压锅你开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了。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改革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但是呢，还有次好的时机，或者次次好的时机，那都是有的，这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来讲的。那么，在这个次好或次次好的时机，要实行政治改革，就需要你有更强的冲动、更强的意愿，也需要更高的技能。在这个层面，我也是比较悲观的。

第三个层面，是现行制度的生存空间。在过去 13 年的经验来看，可能大家认为，这个制度还真是有大家以前没有想到的这个生存空间啊。你看，苏联也垮台了，东欧也垮台了，八九年大家认为要怎么样了，这不是，都搞下来了，越搞越好？我想，你要讲路径依赖的话，领导人他有他的历史经验的学习和路径依赖，他会这么想问题：按照这个历史经验，我无须改动它，反而我有这个生存空间。

第四个就是日程上的优先处理顺序的问题。我为什么强调危机引起改革呢？因为危机带来紧迫感，你必须优先处理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就连带产生某些政治改革措施，然后可能政治改革就出来了。他也许原来不是想搞政治改革，但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这么处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危机，就政治层面而言，基本上是慢性的危机——慢性的危机有时候它就不是危机了。就是说，你从长远来看，它会变成危机，但是今天领导人不认为它是危机。比如说腐败，“亡党亡国”讲了 20 多年了，从陈云八十年代初就讲，他现在还是那样讲。其实它是慢性的，他没有危机感。有一些危机，比如失业问题，他就因为这个已经有那么多人头在那儿等着工作呢，他才会赶快开什么全国就业工作会议，不管他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至少在日程上他把它提上来了。政治改革呢，他没有提。我觉得，没有危机的话，他不会把它提上来。

第五个呢，就是我觉得中国政治改革的智慧资源严重不足。刚才老孙讲了领导人的智慧问题。我觉得，全社会的智慧，在这方面都严重缺乏。刚才老孙也讲到这个技术问题，其实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可以变成技术问题。对于一个高超的政治家，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变成技术问题的。尤其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必定是技术问题，要不然哪有制度呢？制度就象机器，你设计得再好，不能解决技术问题，哪里会有机器呢？我觉得，无论从什么层面来说，我们把政治问题变成技术问题的能力都太低。（孙立平：我们往往把技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对。

还有最后一句话。刚才老萧讲到，你反对这个制度决定论，你说这个制度 A 怎么样，移植过来怎么样。我认为，实际上不存在一种抽象的制度 A，现实中只有制度 A₁、A₂、A₃、A₄。比如说民主吧，民主与民主不一样，美国的民主和英国的民主在制度上都非常不同。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这个移植过程本身，会使概念的制度 A 无可避免地变成 A₁ 或者 A₂，问题不在于这个 A 的适应性，问题就

在于你有没有解决这个移植过程中的问题。它移植中一定会变异，移植过来的东西一定不是原来那个东西，现在的要害是问：你有没有解决移植过程本身中的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本身，就是严重地制约了智慧讨论的空间。你不能讨论这个问题，你不能发表意见，即使发表的话，可能在很小的空间。说上海有几个知识分子见了黄菊，然后几个人在那儿讨论一下。说不定有的人还要**先揣摩一下黄菊**，想一想他能不能接受，我从哪里说比较合适。

徐成：刚才大家对十六大之后最近几年内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作了一个判断。我对这个判断，基本上来说比较赞成，就是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政治改革的机会。但是，确实也像大家刚才讲的，在政治与行政的合理化方面可能会推动一些改革。目前来看，我认为，他更多地从现在已有的这个改革已经出现的矛盾着手，更多地是从国家体制内部出现矛盾的角度去入手。那么，如果一个领导人，一个新的领导层，要想搞政治改革的话，他应该怎么改？没有压力他是不会改的；在压力下，他相信通过改革能够给他自己保持一定的权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肯定会改革。我觉得，这两个条件都有。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步骤。从这个讲，我提出四个建议。

第一个：说的时候不做，做的时候不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在把人民的改革需求吊得很高的时候，千万不能做，因为大家期待是非常高，而且各种改革的方案都可能出台，你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不可能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时候一旦改革，很可能失控。一定是在政治改革的激情相对冷却的情况下，悄悄地做，我觉得这是聪明的一个做法。第二个，绝对不以对历史问题的平反为改革的出发点，一定是一个向前看的改革思路。我觉得，这是稳住阵脚的一个重要手段。第三，要注重改革的顺序。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一个顺序：第一是国家制度建设，第二是党的民主化，第三个是国家的民主化。如果倒过来，先搞国家民主化，一定出现的是党的分裂，一定出现的是反对派、反对党的产生。

第四点，目前可做什么事情。党政关系的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也提出了法治国家，那么什么叫法治国家？就是说，政党一定是在国家宪政体制下实现自己领导权，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从这个角度讲，进入改革，就是说共产党把自己的领导纳入到民主、法治的轨道中去。仍然还是你共产党领导。比如说，共产党通过对人大的领导来实现对国家立法的领导，来实现对高级官员的领导。现在来讲，人大什么作用？人大一个是立法，重大问题的决策，一个就是人事权。无论哪一级人大都一样。那么党现在是干什么？一个是人事，一个是决策，包括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要在一个宪政体制的人大、政府之外，再有个党在发号施令，这不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如果是放到里面去，完全有这个条件。第二点就是在基层民主尤其是乡村选举的基础之上，扩大它的战果，鼓励现在所有的党员，基层党支部，全部去竞选村委会主任。选上了村委

会主任的党员，那当然没问题了，任命你为党支部书记；所有选上了主任不是党员的，立马发展成党员。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么做了。现在在你掌握所有政治经济资源的情况下，你这么说的话，这些人愿意。在选举之前，把共产党塑造成一个可以打选战的政党，把所有能够打选战的政治精英纳入到党内，这时候你才有跟未来的反对党进行竞争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做的。另外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性的联系，现在我觉得更多的是从人事的控制权来实现。这是非常危险的东西。从各方面建立一个更强的制度，是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觉得，这些方面，都符合党的意识形态，政治手段上也具有可行性，完全符合刚才老萧提出来的四个基本原则。当然，中国的政治改革，光想一两个办法还是不够的。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的对中国改革可能建言的力量，他们应该扮演一个角色。

郑永年：大体上我赞同你们的意见，但是，老萧提的两点，我觉得不是那么同意。首先，你讲八十年代这的制度移植，我觉得，没人说真正要移植哪一个西方制度，从来没有那样用过。王沪宁八十年代提出新权威主义，他觉得有个地方民主啊，民主选举啊，说明地方坐大了，那你中央要失控了。还有就是，一提政治改革，就说你们是不是要西化。这是官方使用的‘言说’，过分夸大危机，夸大改革的消极方面。它就是不想改革。还有把政治问题变成技术问题，这是没问题的，技术官僚的长处就是把政治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但是，我发觉，各个方面，税收制度，金融制度，银行制度，这个都可以改革，都可以理性化，但是，政治改革讲什么？讲实在的，这就是政府部门、党的部门的改革。到最终，中国政治改革，一句话，就是党的改革。没有党的改革，那个政府部门怎么样理性化，也不会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程度，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不仅不是权力核心，现在政府部门所做的这个理性化的东西，遇到党的问题就停止了，就是党挡在前面了。

那么党的问题呢，我就比较不是那么乐观。首先，你们强调领导人有没有意愿。江泽民有什么，胡锦涛有没有自由主义倾向，等等。我觉得，个人的意愿并不是很重要。胡耀邦想改革，赵紫阳也是想改革，但是马上就完蛋。（孙立平：

这里是不是有三个环节：改革、搞死、导致社会动荡。现在还没到社会动荡。或者社会出现什么后果，被搞死。）我觉得，尽管有这些变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意识形态的地方还是很多；即使没有意识形态了，但是我们的组织框架还是列宁主义的组织框架，一点也没变，从来没有变过，而且强化了。这个列宁主义的组织框架里面，你可以有政治自由主义的因素，但绝对不允许你有政治自由主义这个东西的生存。这是列宁主义的组织框架的绝对不可以。反而呢，一旦出现，

就要扼杀。所以，在列宁主义这个组织框架里面，他每个人要求生存，都是靠左的，而不是靠右的。不能希望上面出一个真命天子搞改革什么的。我觉得，社会力量、制约因素，更重要。社会力量它本身不会主导改革，但社会力量能跟这个党内因素结合，变成一种力量。

裴敏欣：西方这种政体的出现，有一个很独特的历史现象，就是“国王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它的实际作用，就是权力受到制衡。这就要问，国王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因为国王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之后，他创造的公共福利是巨大无比的。诺思写的文章，就是证明，在英国，一旦国王权力受到限制之后，国债的利息就大大降低，发行量就大大增加，因为不怕国王赖帐。但是，从世界上看，没有一次国王他自动把自己手给捆绑起来，只有到了贵族拿着枪，逼上去说，“你自己不把手绑起来，我就要砍你的头了。”这时候他才把手绑起来。所以，从历史上来说，很难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就是当权者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手绑起来，自动地把自己的权力用法律框架来限制。

这里面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许多政权转移，真是有希腊悲剧的这么一种色彩。要用那种很人道的想法去分析，你肯定是估计错的。它里面有一种内在规律，毛泽东以前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确有这么一种看不见的、巨大的力量，整个制度腐烂、崩溃，你就是看着它要发生，而且以前人家都讲了它要发生，最终还是发生了。当然，也可能有人企图把自己的身体铺在轨道上，企图阻止它的这种悲剧发生，结果是被碾得很碎。这种事情是很多。

最近 20 多年来的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规律，应该引起重视。就是所谓渐进的民主改革模式是绝少绝少，真正从专制体制到民主体制转型，最多的是突发模式，而不是渐进模式。渐进模式唯一成功的，恐怕就是台湾，其他的都是“渐进—突发”混合式，要么就是政权垮台突发。（萧功秦：韩国呢？）韩国是“渐进—突发”。这对今后中国怎么样发展，有意义，应该引起许多人警惕。你再看中国现行那个体制呢，它的可持续性的确很成问题，因为它几个基本的机制都是失灵的。激励机制失灵，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少的人会超脱自己个人利益，为整个政权利益甚至国家利益着想。内部监督机制也是基本失灵，这就出现大面积的腐败行为。那么整合机制呢？就是把各个不同的利益整合起来，这个机制也基本不存在。它可以把少数人的利益整合得相对合理，但总体来说，尽管有“三个代表”，还是缺乏。“三个代表”，说难听点，也就是皇帝的新衣。还不去讲那个合法性机制。

有这么大惯性的这么一个体制运作下去，就等于一个脱轨的火车，它出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并不是一个是否会出轨的问题。等到那个司机他看到要出轨了，是不是刹车，他是否能刹住？就是危机跟改革的那个关系问题。一般人们都

认为危机是促进改革的主要动力，这没有什么争议。但是，碰到这种政治改革是牵涉到政权存亡的改革的时候，它基本上有个铁的规律，就是说：有能力改革的时候，它不愿意改革；等到它想改的时候呢，它已经丧失了改革的能力，所以它到那时候改革，肯定出乱子。中国对苏联、东欧的巨变的一个根本性的误读，就是把它的失败的原因给解读错了。苏联东欧并不是说改革的战略错了，改革的步子错了；完全是因为：等到它改革的时候，政权内部已经腐朽，不堪一击。所以，苏联的那个真正的罪过，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勃列日涅夫。如果拨开了勃列日涅夫来指责戈尔巴乔夫，肯定是不对的。

那么，中国现在改革，是否有那个政治条件呢？撇开政治制定者的那些想法、意愿，我认为现在条件还是有。老邓当初他创下的那些条件，几个框架都给你打好了，合法性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人大改革，法制改革，乡村选举都给你概念上突破了。想来想去，政治改革有许多情况上跟国有企业改革很像。它这个弯路啊，走遍了，到了最后，归根结底，还是国家退出、私有化。政治改革，就是想办法把一个圆圈变成一个方块。其实，西方，你不要看它有意识形态，它其实对人性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它一点就看透：你这本来就是一个涉及到权力垄断的问题，你是要与虎谋皮。你既要让那个垄断党在那个垄断地位上一点都不受损伤，同时要引进对那个垄断党的监督，这还是回到我开始讲的那个寓言：国王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我们一定要看到国王旁边的人，而不能只看到国王。

时殷弘：关于十六大以后中国的政治改革，或者就我们大陆学者来说最适当的提法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景问题，我不想多谈，因为我在其他发言中实际上已经点出了这里边我自己理解存在的困惑等等，这个可能我等一下还会间接地提到。十六大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想把它简化为：一个是目标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最后呢，还有一个小的，是时机问题。

目标问题，无非就是要确立一种认识，所有在中国、在政治上能动的力量，特别是中国的领导阶层，要确立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的认识。你如果不感到一个事情是绝对必要或者非常必要，你大概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关于这个必要性的认识，就牵涉到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冒险，有没有危险，是正面因素还是负面因素。我想，正面因素肯定有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领导也都认识到一部分或者相当大一部分它可能对国家、对政权的稳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的好处。我想非常明显，因为，首先，这是应付我们国际压力和国内压力的一个途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途径。我们都知道，我们内部有很多困难，外部也有很多困难。我觉得，这个民主体制改革，只要是进行得比较合理的，一定能促进国内许多瓶颈问题的解决。不一定它是解决方法本身，我也不赞成制度决定论，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有些时候是不

可缺少的条件。另外，非常明显，无论是应付我们在东亚的安全困难，应付中美关系当中的困难，解决台湾问题，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渐进的政治民主改革，不能解决我们的很多问题，但是可以大大地缓解我们所受的压力，可以大大地创造一种把很多难解的问题解决的优化环境。另外，我想，能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恐怕也是一个顺应世界基本潮流的问题。我想，包括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党领导人，当然每人都有自己利益，但是每人也都有自己一定的对世界的认识。我想，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孙中山的话，就是世界潮流，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我想，邓小平启动经济体制改革，这种认识有很大的作用。

另外呢，如果能够在中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我觉得，对于政治体制领导者个人的历史地位的确定，积极历史地位的确定，甚至可以说伟大历史地位的确定，这好处他是完全能够看到的。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国家行政改革，通过对外关系方面的努力，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跟 20 年前相比，领导人对于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好处的认识是在积累。我不能说已经完成，或者共识已经达到很高的高度，但是，我觉得，认识会有、已经有一定的变化。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认识方面，有一些负面因素、阻碍因素。这个可能我们这几天讨论都提到过了。一个，就是取决于领导人本身相对的政治地位跟政治权威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弱勢的领导人，他恐怕是不大愿意搞也不敢搞，是吧？如果他个人的威望、权威能够得到巩固的话，他有信心的话，就可能事情变得比较好。就是说，在领导人个人威望、个人权力方面，特别是十六大以后，有个权力巩固的问题。

另外，大家多次提到，从“六四”事件和苏东巨变，我们已经吸取的教训，对我们这些年来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有很大好处。但是，历史教训的吸取，往往有的时候有过头的倾向，可能是人们过于谨慎，领导过于谨慎。这是一个负面因素。另外，政治体制改革同其他要做任何事情一样，都有风险。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一个大国，很多困难情况，它这个危险性，特别是处理不好，那是非常糟。但是，看困难看得多的人，往往他高估风险。他把风险看得过大，这可能产生一种阻挡他着手去做这个事情的动力。还有，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光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面临一大堆问题，包括内政的、外交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能不能在一段长的时间内始终占有一个，不说是最优先，始终是相当优先、非常优先的一个问题？它有其他问题的干扰，有的时候面临的眼前的问题，它会干扰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动力。这些都是负面因素。我想，现在存在的主要倾向可能是，领导阶层对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带来的好处有认识，但是可能认识还略嫌不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和风险有认识，但是这个认识可能有些过头。我们希望，对好处和风险，领导阶层能够确立一个比较符合分寸的实际的看法，

特别是多看好处。

第二个，战略问题。我想，肯定，这个事情一定要采取渐进主张，即使这个渐进战略可能不那么成功，即使这个渐进战略要成功可能要很长时间，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缺乏很多基础设施，缺乏很多条件，缺乏心理准备，一定要采取渐进的战略。如果说，其他国家通过渐进式的战略来搞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例子很少的话，但我们中国有另外一个类比，高度成功的，就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通过渐进式战略取得成功的，想一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风险，那时候是多么大，被估计得很大，那时候邓小平还是做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看来好像是渐进的，但是他在当时也说改革就是革命，他当时还是胆子很大的。我们一定要采取渐进式战略，一定要好好地总结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花一代人的时间，20年、25年，甚至两代人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天天要做，月月要做。但是呢，每天只做那么一点，不要做得过头。我们一定要鼓励领导阶层从邓小平这个经济改革高度成功来吸取经验，增强信心。同时，渐进式战略也意味着，我们采取的方法，一定不要贪多，但是要天天做，不断地做，而且做了以后要让全世界知道，要让人民知道，要确立就是我们正在做、我们正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做。

还有呢，要采取一个战略方面也很有名的概念，间接战略。有的时候，它本身不一定是政治体制改革，就像大家刚才讲的，国家制度建设，国家行政机器的改善，这个可以创造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更好的条件。还有一个呢，确实是像敏欣刚才讲的，有的时候，到关口的时候，虽然总的模式我不大赞成突变模式，但有些瓶颈问题需要胆量，需要勇气，去及时地采取一种有计划的冒险，下一个决心，有的要有局部突变的思想准备。一定要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胆量不行。（**裴敏欣**：亨廷顿在《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当中说，**最成功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加突变，一开始总体渐进，关键时候突变。**）所以，在战略方面，我在强调渐进战略的同时，也强调，在瓶颈问题上，关键问题上，如果局部的突变是必须的话，我们要有智慧，有决心，要有计划地冒险。不冒险是不行的。要冒险的时候不冒险，这个也不行。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在几个瓶颈问题上，在当时党内、国内都做了一些冒险的事情。

最后，很简单，时机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再拖下去的话，可能丧失我们的安全阀，可能丧失政治体制改革的——不说最好时机——合理时机。所以，我总是觉得，在思想上，对于这个问题，用一句毛主席的话来说，要“只争朝夕”。我们做起来很谨慎，但这个必要性认识必须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如果要生存下去，要发展下去，要实现中国的伟大目标的话，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而且，这一关成功了，就是在最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

机。我们现在仍然有一个 7%、8% 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是最大的安全阀。我们不能设想，这个 7、8 永远会维持下去。我们应该趁这个时机采取一个渐进式战略，每天做一点事情，每年做一点事情，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时机，争取完成一个中国所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

孙立平：我觉得，这里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动力来自哪儿。刚才敏欣说的，我还不完全同意。就是说，这个国王为什么手绑起来，说有别人存在，不绑就砍头，是吧？我觉得，还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老丁那种办法，就是喝酒，喝醉了，自己就把自己的手绑起来了。什么叫喝醉了？革命理想主义。第二个，世界上所有的国王的手都绑起来了，就你不绑，别人笑话，对吧？邻居的压力。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趋于保守化的情况下，别人砍头的压力已经很小了；现在理想主义起作用也很小。我觉得，可能真正现实的动力，就是人家都绑了，你不绑，……

萧功秦：我最后讲几句。反正，我觉得，充分看到中国在民主化那边，在 10 年里面，有一些条件的逐渐的改善。首先是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数量扩大；第二，社会分化的程度、社会多元化的程度增加，板块型的结构逐渐多元化，这是民主的先决条件、社会条件；第三，社会心态的温和化，减少了激进的、亢奋的、悲剧性的要求民主的那种英雄主义。第四，就是经济改革使当政者的权威的合法性的增加，使他自信心增加，自信心增加使他向改革迈进的这种可能性增加。第五，社会的民主法制这方面的积累。20 年来，十多年来，法制的积累，这个数量在增加。第六，就是民主对于社会整合的作用的认识，我觉得，在组织者当中，他的认识也在增加。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些民主的条件的时候呢，应该有信心，有相当的信心。整体上，就是 9 个字：“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我认为逐渐地可以走向民主。